



人们不知道，这些光影将会风靡一整个世纪。

彼时的上海是名副其实的“冒险家乐园”，华洋杂处，资本涌动，任何新奇的事物都能在这里找到生长的土壤。

1911年6月24日，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上海虹口建造了虹口大戏院。1922年，张石川、郑正秋、周剑云等五人，凑了1万元银洋，创办了著名的“明星电影公司”——名字里充满了野心。起初，公司办公室就设在一家旅馆的客房里。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，他们拍出了大为卖座的故事片《孤儿救祖记》。这部电影的成功，还确立了中国早期电影“影戏合流”的传统——用戏剧化的情节，承载社会教化与伦理关怀。

很快，上海的商业基因迅速为电影艺术搭建起了初始工业框架——但杜宇的“上海影戏公司”、邵醉翁的“天一影片公司”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竞争带来了繁荣，也带来了中国电影的第一次“类型化浪潮”。

当时，“天一”主攻更受市民欢迎的古装片和民间故事，其开山之作《立地成佛》大获成功。而“明星”也不甘示弱，在1928年推出了石破天惊的《火烧红莲寺》。这部融合了武侠、神怪、奇情的影片，在短短数年内连拍18集，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“IP”系列电影，也开启了武侠片这一延续至今的强大类型。

有了片厂，有了类型，还需要造梦的明星。当时上海的媒体生态也为明星的诞生添了一把薪火——《良友》《申报》等画报与报纸成了天然的造星工厂。一个名叫阮玲玉的16岁少女，在报考“明星”时还显得胆怯生涩，不过几年后，她却成了整个时代的悲剧符号。她在《神女》中饰演忍辱负重的妓女，在昏黄路灯下茫然游走的背影，无需一句台词，便足以让后世的观众心碎。她与“电影皇后”胡蝶，一位灵动娇媚，一位温婉端庄，共同定义了中国第一代女明星的标准。当年，她们从服饰发型，到一颦一笑，都被放大在画报上，成为全城女性模仿的对象。

可以说，站在20世纪初的那片电影旷野上，是上海以其灵敏的商业嗅觉、市民社会的活力和中西交融的视野，为中国电影完成了从无到有的一跃。它提供了资本、

人才、市场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提供了一种可能——让电影这门舶来的艺术，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，并讲述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故事。

孤岛时期，电影人的风骨

如果说30年代之前的上海电影更多展现的是商业活力，那么接下来的十年，尤其是在那段被称为“孤岛”的特殊时期，上海电影人则向历史证明了他们的风骨。

1932年，一·二八事变爆发，日军的炮火摧毁了闸北的许多电影片场。国难当头，单纯的娱乐似乎显得不合时宜。以夏衍、田汉、阳翰笙为首的左翼文化人，敏锐地意识到电影作为“最有力的大众媒介”的启蒙力量。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加入或影响各大电影公司，开启了中国电影史上一段独特的“左翼电影运动”。

这一时期，电影人不再满足于才子佳人或神怪武侠，而是将镜头对准了这座城市最真实的一面——在摩天大楼阴影下挣扎的码头工人、失业的知识分子、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……1934年的著名影片《渔光曲》，讲述了渔民家庭的悲惨命运，不仅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，更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“荣誉奖”，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。它的同名主题曲，“云儿飘在海空，鱼儿藏在水中”，传唱大江南北，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。

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。



导演袁牧之在1937年拍出的《马路天使》，至今看来仍是华语电影的巅峰之作。影片开场那个著名的长镜头——从阁楼摇下，穿过弄堂，展现出一幅生动的市井浮世绘，其调度之纯熟完全不逊于同时期的好莱坞。

电影背后，1937年